西夏书籍业

[俄] 捷连提耶夫—卡坦斯基著
王克孝　景永时译

宁夏人民出版社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序　言

很遗憾，收到来自中国决定翻译、出版《西夏书籍业》（莫斯科，1981年版）一书的信时，А.П.捷连提耶夫—卡坦斯基已去世几个月了。此书是他多年劳动的结晶，现在将有中国读者享用，我想他为此定会感到极大的欣慰。按照他的遗孀И.А.法谢夫斯卡娅的请求，我为该书的中文版写了一个序言。我与А.П.捷连提耶夫—卡坦斯基同时在列宁格勒大学学习，同在东方学研究所工作，我们不仅是同事，还是朋友。

А.П.捷连提耶夫—卡坦斯基在苏联（现为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整整工作了37个年头（1958—1995年）。由于有病，他不得不提前退休。然而，直到他生命的最后一段日子，他还来所里参加小组会议，并工作到生命最后一刻。在他工作的几十年里，共著书6部，其中出版的有3部，另外发表论文数十篇。

众所周知，А.П.捷连提耶夫—卡坦斯基的工作地——圣彼得堡东方学研究所，是中央亚细亚研究专家П.К.柯兹洛夫于1909年在哈拉浩特发现的著名西夏文献的书库。由于这种状况，一开始就确定了А.П.捷连提耶夫—卡坦斯基的科研活动方向，从60年代初期，他就已经开始积极地研究西夏问题了。

作为一名天才的艺术家，А.П.捷连提耶夫—卡坦斯基首先对西夏原文插图，即西夏版画产生了兴趣。他详细地研究了所

有收藏于圣彼得堡的版画，并打算出一本收集所有西夏版画的书。遗憾的是他未能这样做，因为他认定只有研究西夏出版物的装潢艺术后，才有可能完成研究西夏图书（无论手写本还是印刷本）作为物质文化现象这一重要任务。因此，在该领域中，他是世界第一个、似乎是至今惟一的专家。

《西夏书籍业》一书乃是А.П.捷连提耶夫—卡坦斯基已经出版的3部书之一。此书以柯兹洛夫藏品作为惟一的参考材料，然而这丝毫没有给此项研究带来任何不利的因素。圣彼得堡乃是世界上收集西夏图书规模最大的地方（世界上其他任何一处的收藏在西夏原文的数量上均不能与它相比）。由于该处藏书是由所有可能装订的方法（手卷、经折、蝴蝶等等）装订的，所以它足有一定的代表性。

在А.П.捷连提耶夫—卡坦斯基《西夏书籍业》一书中包括西夏所能具有的印刷术的方方面面。在西夏学的历史中，他对西夏的纸张、颜料、胶水、各种装订形式等等也是首次作了详尽的描述。

还应该特别强调的是，А.П.捷连提耶夫—卡坦斯基并不仅仅局限于西夏印刷术这个框架中，他试图将西夏印刷术研究列入中央亚细亚研究的一部分。因此，他不仅描述与西夏毗邻的各民族，而且还描述远东的其他一些民族的印刷术。他渊博的学识永远为那些了解他的人所倾倒。我想，看过此书的中国读者也会对此给予应有的评价。

我特别要指出的是“西夏书籍的装帧艺术”这一章，作者在其中涉及的是他十分喜爱的西夏版画。西夏文献中有些版画的年代是比较早的，但在А.П.捷连提耶夫—卡坦斯基之前，似乎没人对其进行论述。我想作者竭力向读者介绍西夏人的肖像这一点，甚或引起中国读者产生极大的兴趣。这是А.П.捷连提耶

夫—卡坦斯基的书最为有趣的内容，并应予以注意：这是第一次基于西夏版画对西夏人外表所作的描述。

А.П.捷连提耶夫—卡坦斯基终生献身于他所选择的道路——西夏文化研究，并深深地为其所吸引。我看，这在他的第一部书《西夏书籍业》中已是清晰可见了。我也非常希望中国读者，抛开俄罗斯问题不谈，去感受他的迷恋之处，并给А.П.捷连提耶夫—卡坦斯基这一著作以恰如其分的评价。

文科博士、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
圣彼得堡分所高级科学研究员、
宁夏大学兼职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
西夏文化研究中心学术委员

К.Б.克 平

1998年12月14日

目　录

导言 …… (1)
第一章　西夏书籍的制作技术 …… (10)
第二章　黑城所出注明年月的西夏书籍和写本 … (47)
第三章　西夏书籍的装帧艺术 …… (54)
第四章　写本书 …… (71)
第五章　印本书 …… (96)
第六章　11—13 世纪的西夏文献
——黑城遗书 …… (129)
第七章　书籍和人 …… (162)
结论 …… (185)
附录 …… (190)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导　言

最近一个时期，人们对书籍这一人类文化重要产物的兴趣大起来了。书籍不仅只从狭窄的古体字角度被看做是人们精神生活的遗留物，而且被看做是某一社会阶段社会发展的证据和物质文化的标志。书籍反映一个社会的文化需要，而社会提供生产书籍的技术条件。

发现于黑城，现藏于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列宁格勒分所（即现在的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因该书出版时，苏联尚未解体，故有是名。为了保持本书原貌，此类名称原样翻译，不作改动。——译者）的图书，在上述各种角度都引起人们的兴趣。此外，这批图书不仅是苏联，也是世界上时间很古的印本书珍品和13—14世纪大批东方刻本和写本的收集品之一　由于这批图书提供了东方和西方各国书籍业发展的特点（西方显然受了东方各国的影响），因此我们以极大的兴趣对收集品中的资料进行研究。它们像同类资料一样，提供了研究书籍史的重要环节。

本书专门研究作为西夏文化珍贵文献的黑城收集品。

黑城图书发现前对西夏文的研究

这一时期在西夏学史上可称之为准备时期。本阶段的主要成果是魏礼、沙畹、德维利亚、卜士礼、毛里斯等人取得的，他们

发现了第一批西夏文字：居庸关门券上的石刻、凉州出土的西夏文钱币、凉州石碑、《妙法莲华经》，断定出这些被发现的文字是西夏字，并首次尝试着予以解读[①]。毛里斯对第一部西夏文书籍《妙法莲华经》的发现，使他知道了约300个西夏字的读法和意思，并获得了西夏语语法的某些资料。但所有这一切还不能使西夏学成为东方学的一个独立学科。

发现西夏文书籍开始的阶段

从这时起可称之为西夏学的真正初期阶段。

1908年4月1日（俄历3月19日），俄国的蒙古—四川探险队在П.К.柯兹洛夫率领下，在阿拉善沙漠发现了黑城遗址。

看来，探险队长本人及队员们起初都不知道他们的发现是多么重要。值得注意的是，当柯兹洛夫第二次来到黑城发现写本后，也断定不出这种文字是什么字，因此就把它称做“神秘的文字”[②]。直到1923年，柯兹洛夫在出版的《蒙古、安多和死城哈拉浩特》一书中才首次使用了“西夏文”这个概念[③]。

下面较详细地叙述一下当时的发掘经过。

当时，由于探险队的考察任务不仅仅是考察黑城，因此，发掘工作漫无计划地进行，带有一定的盲目性。尽管如此，在最初几天就取得了可喜的成果。

---

① 关于西夏学史这一时期的详细资料见：Н.А.聂历山：《西夏学简史》，载《西夏语文学》第1卷，莫斯科，1960年版，第19—32页；Е.И.克恰诺夫：《只有文字说明问题》，莫斯科，1965年版。

② 《蒙古—四川探险队日记》，载《苏联地理学会档案》，第18宗，目录1，第157号。

③ П.К.柯兹洛夫：《蒙古、安多和死城哈拉浩特》，莫斯科—彼得格勒，1923年版，第109、556页。

探险队离开黑城向更远的东南方向行进。但是，俄国地理学会来信说这座死城的发现很重要，并指示柯兹洛夫放弃去四川。于是，在冬季用两个月的时间考察了安多之后，次年春天，他又重新来到黑城[①]。

1909年5月，探险队再次勘察故城遗址。和上次一样，柯兹洛夫让自己的同伴在蒙古民工来到之前随意地进行发掘[②]。

从第一天（5月23日）起，探险队员们就发现了写本碎片、纸币、器皿、古老的工具等等；在一座建筑物里找到一本用金色颜料写的方形藏文小书。

5月24日，在直接修在城堡北墙上的一座小规模祈祷室旁边，找到一些汉文写本。在城堡东南角，发现了一些阿拉伯文写本残片。

5月25日，蒙古民工终于来了，发掘工作开始紧张起来。

5月26日，古城区内再次发现写本，其中多数是汉文的，也有少量藏文写本残片。这点在柯兹洛夫的日记中写得不清楚，他根据某些符号认为这些写本不是藏文，并希望最后在圣彼得堡搞清楚这一问题。

5月27日，在“A塔”中除了找到佛教法器外，还发现了藏文写本残片。

5月30日，探险队开始发掘城外西边最大的一座塔。早晨9点，在塔内发现了第一批佛像和写本。

这座塔后来被称做“著名的塔”，现藏东方学研究所列宁格勒分所的黑城收集品中的大部分写本和木刻本都是从这座塔中找

---

① Е.И.克恰诺夫：《只有文字说明问题》，第33页。

② 以下关于发掘和发现经过的全部资料引自《蒙古—四川探险队日记》（载《苏联地理学会档案》，第18宗，目录1，第157号），本书中首次公布。

到的。

根据柯兹洛夫日记判断，他本人没有用全部时间参加这座塔的发掘工作，仅仅有时来这里看看。民工们把找到的书籍和东西搬运到探险队的帐篷中，并在那里进行包装，因此，我们不知道书籍是按怎样的顺序放在“著名的塔”中的。但是柯兹洛夫指出，大部分书籍和写本放在塔的上部，因此保存得很好；个别书籍和写本被放在下层（一具僧人骨骸的头顶），由于该处很潮湿，地层发霉，捡起来时书籍散发出难闻的霉味。

1909年6月16日，探险队离开黑城。包括写本和书籍在内的发现物被仔细包装好并运往圣彼得堡。

在柯兹洛夫的探险以后，可以说真正的西夏学初期阶段开始了。

1909年，圣彼得堡大学副教授A.И.伊凤阁在地理学会的一间房子里打开黑城发现品的包装，发现了迄今惟一的一部著名的西夏文—汉文字典《掌中珠》（即《番汉合时掌中珠》——译者注）。这件发现品使编纂西夏—俄词典的工作有了可能。同年，伊凤阁发表《西夏语研究》[①]一文，公布了自己的发现。他还发表《柯兹洛夫在黑城的发现物》（圣彼得堡）。1911年4月，伊凤阁向科学院历史语言所年会提交了报告——《西夏史上的一页》[②]，对黑城历史作了概述，并将《观弥勒上生兜率天经》汉文本题记译成俄文。

1913年，伊凤阁写了《黑城文献》。

1916年，伊凤阁出版了西夏文汉文对照的《观弥勒上生兜

① A.И.伊凤阁：《西夏语研究》，载《圣彼得堡皇家科学院公报》，1909年。

② 载《皇家科学院通报》第6集，1911年第11号，第831—836页；又见沙畹译、伊凤阁著：《西夏史上的一页》。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率天经》(彼得格勒)。

1918年，伊凤阁发表《西夏文文献》[①] 一文。

在上述这一时期，伊凤阁编纂了西夏—俄词典，但这部词典的手稿我们没有找到。

符拉基斯拉夫·留得维戈维奇·科特维奇是同伊凤阁一起打开黑城收集品包装的人，他对其中的中国元朝纸币作了记述[②]。不用说，元朝纸币属于黑城历史的后期。

三位中国学者罗振玉及其子罗福成、罗福苌对西夏语研究作出了重大贡献。他们的活动被聂历山详细地描述在《西夏学史纲》一文中[③]。

德国学者安娜·本汉底和艾尔温·冯·哈萨对西夏学作出巨大贡献。他们在1919年出版的著作中得出了和罗福苌相同的结论[④]，但当时他们并不知道罗福苌的文章。对伊凤阁第一部作品引起注意的是劳费尔，他1916年发表了一篇论文[⑤]，首次确定西夏语在梵藏语系中的位置。他指出现代语言中最接近西夏语的是罗裸语和莫索语，这三种语言属于一个语系（梵—莫—罗）。

B.M.阿列克谢耶夫在收入俄国科学院亚洲博物馆《文集》的一篇论文中谈到了西夏藏品的学术意义[⑥]。

---

① 《俄国科学院通报》，第6集，1918年，第799—800页。

② B.Л.科特维奇：《中国元朝纸币的样式》，载《俄国地理学会通报》第45卷，1909年第8期，第474—477页。

③ H.A.聂历山：《西夏语文学》第1卷，第26页。

④ A. Bernhardi und E. von Zach. Einige Bemerkungen über Si - Hia Schrift und Sprache. - *Ostasitache Zeitschrift*. 1918—1919. №3 - 4.

⑤ B. Laufer（劳费尔）The Si - Hia language. A Study of Indc - Chinese Philolgy. - *T'ong Pao*. 2 ser. vol. 17. 1916. c. 1 - 126.

⑥ B.M.阿列克谢耶夫：《中国藏品和朝鲜藏品》，载《俄国科学院亚洲博物馆百年简述（1818—1918年）》，彼得格勒，1920年，第64页。

1924年，中国的戴锡章出版了《西夏纪》[①]，书中收集了西夏史的汉文资料。

A.A.龙果夫也在一段时间研究过西夏收集品。他在1930年发表了西夏写本的简明目录[②]。

K.K.弗鲁格在其有关宋代印刷书籍的专著中列举了西夏藏品[③]，并于1933年写出专文刊登在《东方书目》上[④]。

H.A.聂历山可以称之为俄国最杰出的西夏学专家。他作为日本学家开始学术活动。聂历山还是著名的语言学家。20年代初期他对西夏语发生了浓厚的兴趣。他1925年到达北京，拜访了自己过去的大学老师A.И.伊凤阁。伊凤阁也乐于和他一起分享西夏学资料。伊凤阁给他提供了附有藏文音译的几幅西夏文残片的照片，并使之出版。聂历山1926年发表的西夏学方面的第一篇文章就是对这些残片的研究成果[⑤]。这实际是世界上第一部西夏语汇集（如果不算西夏人自己编纂的字典），共收334个西夏字。他在这篇文章中对恢复许多西夏字的读音作了尝试。

1927年，H.A.聂历山写了一篇有关西夏语汇的文章[⑥]，这是为读者提供西夏词汇编纂范围的参考资料。

1929年秋天，H.A.聂历山从日本返回俄国，着手研究柯

---

① 戴锡章：《西夏纪》（无发表出版地点），1924年。

② — *Bulletin of National Library of Peiping*. vol. 4, 1930. №3, c. 367 — 388.

③ K.K.弗鲁格：《10至13世纪中国宋代书籍印刷史》，莫斯科—列宁格勒，1959年版，第4、20、75、76、212、220、325页。

④ K.K.弗鲁格：《关于西夏刻印的汉文佛经》，载《东方书目》第2—4辑，莫斯科，1933年版，第158—163页。

⑤ N. Nevsky. A Brief Manual of Si — Hia Charactera With Tibetan Transcriptions. — *Research Review of the Osaka Asiatic Society*. №4, 1926.

⑥ H.A.聂历山：《西夏语语法》，第1卷，第95—106页。

兹洛夫搜集的西夏藏卷。1931 年，他发表了《西夏学史纲》[①]。1931 年，出版了他的大部头著作《论西夏国家的名称》[②]。在返回俄国后开始的全部时间里，聂历山根据东方学研究所的西夏藏卷编写西夏—俄词典。到 1937 年，这个词典已收了 6000 个西夏字。

聂历山的大部分西夏学著作被收入 1960 年出版的两卷本著作《西夏语文学》，此书被授予列宁奖金。

著名汉学家伯希和为西夏学花费了不少精力和时间。他早在 1900 年开始研究西夏时，出席了第一届远东研究会议，结识了许多会议代表，并得到毛里斯赠送的《妙法莲华经》。他在 1914 年手写了有关黑城所出汉文文书的论文[③]。1926 年又发表对聂历山附有藏文音译的西夏文著作的评论[④]。1932 年，他又著文评论聂历山的《西夏学史纲》[⑤]。

艾尔米塔什博物馆研究人员 B．H．卡津死于 1940 年列宁格勒被围困期间，他的著作 1960 年才得以问世。[⑥] 此书叙述黑城的发现史、黑城史的年代资料，饶有风趣地介绍了黑城发现的纸币。

---

① 《苏联科学院院报》，1931 年第 1 期。

② 《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论丛》，1933 年，第 2 卷，第 3 期。

③ P. Pelliot（伯希和）. Les documents chinois trouves par la mission Kozlov a Khara－khoto. －*Joureal Asiatique*. 11 ser. t. 3, 1914, c. 503－513.

④ P. Pelliot. A Brief Manual of the Si－Hia Characters With Tibetan Transcriptions, by Nycolas Nevsky. －*T'ong Pao*. 2 ser. vol. 24, 1926, c. 399－403.

⑤ －*T'ong Pao*. vol. 29, Leiden. 1932, c. 226－229.

⑥ B．H．卡津：《哈拉浩特史问题》，载《国立艾尔米塔什丛刊》，第 6 卷，东方各民族文化和艺术，列宁格勒，1960 年版。

二战以后的西夏学

这一时期，西夏学的研究在国内和国外都有了急骤的发展。60—70年代特别繁荣。

捷克斯洛伐克学者卡米尔·谢德拉克对西夏语音的某些问题进行了研究[①]。

国立艾尔米塔什博物馆1964年学术会议报告集中收录了Т.В.格列科、Н.В.吉亚科诺娃、М.Н.克列托娃、Е.И.鲁勃—列斯尼钦科和М.Т.鲁多娃等人研究该馆所藏西夏文献的报告提要[②]。还收录了Е.И.鲁勃—列斯尼钦科的报告提要《黑城出土的元代纸币》。

1966年，列宁格勒大学东方系学术会议报告集中有В.И.库兹涅佐夫的报告提要《关于西夏文字的语音特征》，作者试图证明德维利亚说西夏文是音节文字的论点是错误的，认为西夏文是一种既表音又表意的混合文字。

目前正领导编写黑城汉文遗书叙录小组的Л.Н.孟列夫，早在1961年就对黑城汉文藏卷发生了兴趣。在纪念勒里希的《亚洲民族研究所简报》上，他发表了《黑城出土的早期出版物》[③]一文。作者仅仅依据汉文，介绍了黑城收集品的纸质、装帧和最珍贵的藏卷。孟列夫在1967年《中国古代文献研究》[④]一文中研究敦煌文献时，对黑城出版的汉文书籍也予以高度重视。他还指出黑城汉文书籍中的插图对研究11—13世纪中国木

---

① K. Sedilacek. Zur frage der etymologie der tangutischen partikein Ta, Ngu, Ri, Ki, Tound ɯq. – *Central Asiatic Journal*. vol. 7, 1962, №3, c. 143－149.

② 《学术年会报告提要》，列宁格勒，1964年版，第59—61页。

③ 《亚洲民族研究所简报》第7集，1961年版，第143—149页。

④ 《苏联科学院通报》，1967年第8期，第59—62页。

版画的价值。

1964年出版了克拉乌松的《未来的西夏研究》[①] 一书。该书包括“西夏语言”、“西夏历史”等章节。

1964—1969年，研究西夏文藏卷的小组成员有К.Б.克平、В.С.科洛科洛夫、Е.И.克恰诺夫和本书作者。我们在5年里分别写了卡片并出版《有真迹复制和俄译〈文海〉、〈文海杂类〉》[②]，这部著作的出版实际上为读者提供了西夏文词语。

1966年出版了《西夏文译的中国古典作品》(影印本)[③]。此书由В.С.科洛科洛夫和Е.И.克恰诺夫合编。他们还写了前言、西夏文汉文对照和索引。

М.В.索弗罗诺夫利用西夏文藏卷资料写了专著。

除了上述论著外，还有一些普及性读物，如Е.И.克恰诺夫的《只有文字说明问题》(莫斯科，1965年版)、Е.И.鲁勃—列斯尼钦科和Т.К.萨佛拉诺夫斯卡娅的《死城哈拉浩特》(莫斯科，1968年版)、Е.И.克恰诺夫关于西夏学的一般和个别问题的许多文章，以及《西夏国史纲》(莫斯科，1968年版)，西田龙雄的专著[④] 和其他许多著作。

目前，Л.Н.孟列夫正在研究黑城汉文遗书，К.Б.克平、Е.И.克恰诺夫和本书作者继续研究西夏文遗书，科学院通讯院士彼古列夫斯卡娅研究黑城发现的叙里亚文残卷。这样，对黑城藏卷的研究一直继续到今天。

---

① — *Asia Major*. vol. 11, 1964.

② 《文海》第1—2卷，莫斯科，1969年版。

③ 《西夏文译的中国古典作品〈论语〉、〈孟子〉、〈孝经〉》，莫斯科，1966年版。

④ 西田龙雄：《西夏语的研究》(上下册)，1964—1966年版。

第一章　西夏书籍的制作技术

纸

10—13世纪西夏国的繁荣决定了对书写和印刷书籍的需求，柯兹洛夫在黑城发现的大量图书就是证明。

具备物美价廉的书写和印刷材料是发展书籍业的必要条件。纸草、缣帛、竹木、黏土这些人们在远古时期用来书写文字的所有材料都已经不方便了，最合适的书写材料——纸已广泛流传于中央亚细亚和远东各国，而且很早就出现了。比较物美价廉、轻便耐用的纸延长了写本书籍保存和传播的期限，并且是产生印刷术的先决条件。

瑞典探险队在1931年5月获得了关于纸的发明的第一个考古证据[①]。考古学家佛里克·伯格曼对距黑城不远的爱得津—高勒居民点进行了发掘，从废墟中挖出的其他物品中掺有碎纸，这就排除了这些碎纸是偶尔带到古地层中的可能性。当时还发现了写在木简和丝帛上的文献，时间为公元94年到98年[②]。中国考古学家劳幹依据这些资料，认为爱得津—高勒纸制成的最晚年代

① T.F.卡特：《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及其向西方的传播》，纽约，1955年版，第6页。

② 最晚的日期是公元98年2月24日。

是公元98年。

中国史书上最早提到纸。按中国传统说法，纸是蔡伦发明的[①]。他吸收前人经验，在公元101年用旧鱼网、破布和麦秸造出了纸。劳幹认为，在伯格曼发现以前，这种纸是世界上最早的纸。

印刷术发明以前，纸在中央亚细亚得到了广泛流传[②]。

公元8世纪，纸的生产工艺同被俘的中国工匠一起传入撒马尔罕[③]，“撒马尔罕纸”（从此就如此称呼）很快就闻名于东方各国。在其他城市，主要是巴格达和大马士革也开始造纸。纸首先从阿拉伯帝国的西班牙城市传给欧洲人，欧洲长时期内称其为“大马士革纸”。

纸的制造工艺由阿拉伯人传到西班牙和意大利。公元13世纪，这些国家已经能独立造纸。卡特认为，欧洲最早的印刷用纸和“撒马尔罕纸”一样，其制作技术和成分同中国纸很相近。[④]

西夏国兴起（982年）以前，纸作为文化生活不可分割的部分在整个东方广泛传播。8—9世纪，中亚和近东开始造纸，中央亚细亚还要早些。在与西夏同时代的宋朝，造纸业繁荣发达，出现许多大商号[⑤]。造纸术传到朝鲜后，纸的生产又得到发展，

---

① T.F.卡特：《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及其向西方的传播》，纽约，1955年版，第6页。

② T.F.卡特：《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及其向西方的传播》，纽约，1955年版，第7页。

③ T.F.卡特：《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及其向西方的传播》，纽约，1955年版，第8页。

④ T.F.卡特：《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及其向西方的传播》，纽约，1955年版，第8页。

⑤ K.K.弗鲁格：《10至13世纪中国宋代书籍印刷史》，莫斯科—列宁格勒，1959年版，第33—34页。

甚至出现了一种被称做“高丽纸”的特等纸[①]。

西夏人只是采用和发展了他们的前辈和近邻文化发展的古代中央亚细亚和远东各民族的造纸工艺。当然，他们也根据当地条件给造纸技术注入某种新工序。

对纸的考察，自然首先需从造纸原料谈起。

远东民族在缫丝时出现的一种现象，使他们产生了造“纸”的最早念头。将煮熟的蚕茧排放于漂席，并投入水中缫成丝时，漂席上出现一层很薄的丝浆，晒干后变成一片，有人认为，这就是最早的纸[②]。宋代就用这种方法造出过特别高级的品种[③]，后来“幡纸”失去了原来的含义，只不过是指高级纸。正如化验结果所表明，时间较晚的“幡纸”是用植物纤维造的[④]。

如上所说，蔡伦被认为是纸的发明者，他用渔网、破布等造纸。但是在他以后，用来造纸的原料大概主要是含杂质少的植物纤维。

从很古时候起，远东各国用树皮和桑树皮造纸。这种桑科植物主要生长在缅甸、中国等地。司马迁提到首次用树皮做的不知是纸还是织物[⑤]。马可·波罗讲述过元朝（1280—1367 年）纸币，

---

① K.K.弗鲁格：《10 至 13 世纪中国宋代书籍印刷史》，莫斯科—列宁格勒，1959 年版，第 35 页；《古今图书集成》，上海，1934 年版，第 654 册，第 152 卷，第 28 页。

② T.F.卡特：《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及其向西方的传播》，纽约，1955 年版，第 9 页。

③ K.K.弗鲁格：《10 至 13 世纪中国宋代书籍印刷史》，第 152 卷，第 28—29 页。

④ И.A.沃托夫：《关于“幡纸”问题》，载《乌兹别克斯坦社会科学》，1964 年第 9 期，第 48—54 页。

⑤ T.F.卡特：《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及其向西方的传播》，纽约，1955 年版，第 9 页。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